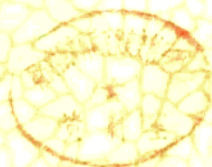


皖事拾零

许汉三 陶若存 哈晓斯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本书辑有两位阅历丰富的老人分别撰写的跨越半个世纪的40余篇回忆短文以及一位青年作者的20多则史事钩沉。每篇各自独立，但又有其内在联系，务求形散而神凝。它们或写一人，或写一事。写一人，并不追求绘其全貌，旨在留下往日那难忘的一瞥；写一事，也不一定必写重大历史事件，惟求略见一斑，旁及全豹。所以这本书不同于一般史料专辑，能为读者提供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让历史告知未来。

作者许汉三同志，解放前在安徽政界17年，历经六任省主席，并曾多次接触省统治集团决策中心，对于旧时皖政，知之甚多。作者陶若存同志，解放前曾任安徽省参议会副议长，为安徽旧时省内官职最高者之一。他们的回忆文章，对于研究安徽历史，是十分珍贵的。青年作者哈晓斯勤于治学，他在现时极少看到的文献资料中，发掘了不少已被时间淹没了的史料，弥补了“五四”时期“三亲”史料的不足，亦十分难能可贵。他们都可以说是安徽史事的知者了。清朝的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簿书稠匝，卷牒纷披……昧者徒争于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刷术的日益精巧，“簿书稠匝，卷牒纷披”的程度也日甚一日，学习历史需求教于知者势必更为重要。为了满足关心安徽历史的广大读者的需要，特此辑录成册，公之于世。

本书的责任编辑是安徽省政协文史编辑部的汪泗祺，金宏慧同志也参加了编辑工作。囿于识见，难免存有谬误之处，敬

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 8 月

目 录

皖事拾零·····	许汉三 (1)
一、刘镇华主皖时期官场见闻·····	(1)
(一) 刘镇华主皖前的经历·····	(1)
(二) 刘镇华主皖的班底·····	(4)
(三) 官署旧规种种·····	(13)
(四) 官场中的攘夺和倾轧·····	(18)
(五) 刘镇华的生日·····	(26)
(六) 禁烟和观赏阿芙蓉·····	(27)
(七) 枪毙朱雁秋的内幕·····	(29)
(八) 凶恶的反共刽子手·····	(31)
(九) 刘镇华为什么神经错乱·····	(34)
二、我所知道从刘尚清到廖磊几任省主席·····	(35)
(一) 世态炎凉·····	(35)
(二) 刘尚清主皖原委和牢骚·····	(38)
(三) 带着洗衣妇逃难的蒋作宾·····	(40)
(四) 涂抹胭脂的国民党军官·····	(41)
(五) 廖磊给我的印象及其死因·····	(42)
(六) 抗战初期的财政厅长章乃器·····	(48)
(七) 章乃器的后任杨忆祖·····	(53)
(八) 孙仲尧谈徐树铮二三事·····	(54)
(九) C C的不得人心·····	(58)
三、李品仙当政时期轶事·····	(59)
(一) 党政军总办公厅·····	(59)

(二) 取得李品仙对我信任的几件事·····	(62)
(三) 李品仙的为人和书画爱好·····	(64)
(四) 新桂系少壮派韦永成·····	(68)
(五) 白崇禧的反共·····	(73)
四、抗战时期我在太和县的经历·····	(76)
(一) 在地方军政矛盾中出任县长·····	(76)
(二) 太和囚犯·····	(79)
(三) 大敌当前·····	(80)
(四) 风雨飘摇·····	(83)
(五) 昙花一现的涡北挺进军指挥部·····	(88)
(六) 太和两派的斗争·····	(89)
(七) 一县之内两个流亡省政府·····	(90)
(八) 太和“三祸”·····	(92)
(九) 何柱国谈李品仙出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的 由来·····	(95)
(十) 唐邦植谈没有到任的安徽省主席石友三·····	(98)
(十一) 我离任时的太和形势·····	(100)
五、解放战争时期见闻·····	(101)
(一) 宿县县长任内二三事·····	(101)
(二) 出任芜湖县长·····	(107)
(三) 美国的救济物资和英国人的嘴脸·····	(108)
(四) 芜湖县选举的真相·····	(110)
(五) 李品仙装病芜湖避风波·····	(111)
(六) 诲人不倦的周新民·····	(113)
(七) 张治中机智救党人·····	(117)
附：绿城纪行·····	(119)
往事漫忆·····陶若存	(123)
一、少时印象较深的几件事·····	(123)

二、在十九路军的经历·····	(126)
三、广西见闻·····	(149)
四、安徽十二年·····	(156)
五、结束语·····	(189)
皖人轶话 ·····哈晓斯	(190)
陈独秀与旅沪皖事改进会·····	(190)
胡适、陶行知、蔡晓舟等人的《根本改造安徽省教育会的宣言》·····	(193)
胡适为“六二”学潮所作的诗·····	(195)
蔡晓舟与蔡元培的一段交往·····	(197)
蔡晓舟与蔡元培、周作人关于文字改良的通信·····	(200)
蔡晓舟史实拾零·····	(205)
高语罕、刘希平与芜湖早期义务教育·····	(219)
高语罕早期诗作辑注·····	(224)
阿英的原名及早期革命活动·····	(236)
阿英早年的一场笔祸·····	(238)
蒋光慈早期史事三则·····	(240)
蒋光慈早年的一封信·····	(248)
蒋光慈旅俄残简及佚诗·····	(253)
蒋光慈与郭沫若·····	(258)
最早反映芜湖罢市斗争的小说·····	(261)
李宗邨与全国各界联合会·····	(264)
一幅历经劫难的画卷·····	(275)
吴樾名辨·····	(277)
旅京皖事改进会及其周刊·····	(278)
芜湖学社和《芜湖》半月刊·····	(281)
五四时期芜湖“打商会”事件真相·····	(291)
关于“六二”学潮的又一首诗·····	(298)

萧楚女与芜湖学生的“驱李运动”	(301)
出席1922年远东会议的安徽代表	(306)

皖事拾零

许 汉 三

一、刘镇华主皖时期官场见闻

（一）刘镇华主皖前的经历

刘镇华是河南巩县人，前清附生，毕业于保定法政专门学堂。他在北洋政府时期，先后任陕西省长、督军达八年之久。北洋政府时期，各省的督军、省长，一般都和直、皖、奉三系有密切关系。督军大都出身于武备学堂，或系日本士官系统。刘镇华既不是军事学校出身，又不属于直、皖、奉任何一系。他之所以能够长期不倒，就在于他善于窥察形势，随风使舵，趋奉攀缘。在不利的情况下，又能低声下气，忍人之所不能忍。他的用心之险，变化之速，几乎令人目眩。

刘镇华在北洋政府时期军事上依靠的资本，是由豫西一带帮会势力和所谓游侠之徒所组成的“镇嵩军”。他之所以能够组织这支队伍，完全得力于他的豫西同乡新安县铁门人张钫（伯英）的提携。可是不久，他就出卖了张钫。

辛亥革命时，张钫任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进攻清政府军赵倜，双方在陕豫边境一带进行拉锯战。刘镇华就在这

时和豫西有名的帮会首领王天纵等率领一部分地方武装，投入了张钫部下。因为刘是文人，被张钫任命为大都督府书记官。后改任参议，做对外交涉工作。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因为军队太多，地方财力不胜负担，决定裁兵。张钫的部队人数最多，限额编为一师，要裁撤3000人以上。张钫就建议把裁下的3000人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命名为“镇嵩军”，征得河南当局同意，驻于河南府及汝州一带，并保荐刘镇华任镇嵩军统领。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日趋反动。1913年，孙中山发动了讨袁战争。南方派代表持密函邀约张钫共同讨袁。这个代表路过刘镇华的防地时，被刘查获。刘本来是张钫的旧属，又是同盟会会员。他这时看到袁的实力远远超过孙中山所领导的讨袁势力，就背弃了同盟会会员的立场，不但不参加讨袁，反而出卖了张钫，向袁世凯告密，从此得到袁的信任。而张钫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担任散职，从此一蹶不振。

1918年是皖系势力最盛时期；段祺瑞控制着中央政权，各省的政权也多为皖系军人所把持。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是段祺瑞的嫡系。当年2月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领导的陕西靖国军攻打西安，陈树藩危在旦夕，段祺瑞调派刘镇华率领镇嵩军援陕。刘以陕西省长相界为条件，支援陈树藩。他打败于右任，取得了陕西省长的地位。1920年直皖战争时，他看到皖系势衰，又转而投靠直系，赶走了陈树藩。当时直系冯玉祥任陕西督军，刘仍任省长，彼此交谊甚笃。他对冯百般依顺，以博取冯的欢心。可是1924年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拥段祺瑞为执政，组织国民军一、二、三军联军和奉系争雄时，他又对他的部下作“段可捧，吴不可背，冯要讨”的指示，和冯背离。刘镇华在陕多年，一贯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敌，1926年曾围攻于的部属李虎臣、杨虎城于西安达八个月之久。可是到1927年2月，冯和于率领的国民联军由西北进军中

原和北伐军会师时，他又通过张钫关系，再度和冯合作。刘镇华有鸦片嗜好，烟瘾很大。冯玉祥则崇尚简朴，提倡戒烟。这时他的军队被冯编为第八方面军，归鹿钟麟指挥，开到豫东兰封、考城一带和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作战。此时冯玉祥下禁烟之令，刘镇华很怕冯玉祥借口他有鸦片嗜好，褫夺他的军权，所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要断戒烟瘾，而且用硬戒的方法。因此，刘曾七天七夜难过得陷于昏迷状态。冯玉祥得知此事后，曾派参谋长持他的亲笔手谕到前方，命令刘恢复吸烟。手谕大意是：前方战事方酣，当前要务，是争取胜利。希你以军事为重，俟大局底定后再作戒烟之图云云。刘则不接受这个命令，终于在7天之后，逐渐恢复常态，戒了烟瘾。这是我在1927年深秋，以河南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开封各界慰劳团到前方劳军时，第八方面军政治部中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在不利情况下有一种忍劲和狠劲。

刘镇华在北洋政府和北伐以后，历经政局变化而不倒，还是在于他善观时变，长于顺应各个方面的关系。

1933年，刘镇华之所以出任安徽省主席并兼任“豫鄂皖边区剿共总司令”，确实得力于新政学系杨永泰和张群的支持。可是，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他的五弟刘茂恩，受他的影响，在双方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背叛阎、冯，活捉了河南省主席万选才，率部投蒋，对蒋之得以打败阎、冯，取得胜利，确实是立了大功。蒋对刘镇华有酬佣之意，也是重要原因。

当时的安徽直属于南昌行营。蒋介石大量印发曾国藩、胡林翼之书，盛倡孔孟学说，无非是想借封建势力和封建政治理论，以抵抗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革命势力的发展。国民党官吏在口头上以人民的公仆自命。但刘镇华及其以后几届省府的官吏，实际上都以统治者自居。省府的政令主要是“督课农桑，催征赋税”。所以刘镇华就以汉代某太守的“抚字心劳，催科

政拙”的一句话，作为要求专员、县长的最高信条。刘镇华颇以他的这种号召自诩，自以为是得到政治的真谛，实际上却是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欺世盗名伎俩的翻版。国民党这种昧于时代的倒退和堂吉珂德式的愚蠢行为，仅十多年，也就碰得头破血流。我在抗战时期，曾担任过县政工作，思想和言行，也受影响，今已老大，虽知其非，但已悔恨莫及了。

（二）刘镇华主皖的班底

30年代，甚至40年代，国民党各级政府都没有建立人事制度。省县各级政府重要工作人员都由主管官自己延揽招聘，活象戏院老板的组班。做官较久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如秘书、科长、总务、收发、鉴印、警卫等一应俱全。这些人都随着这个官员同进退，并习惯称呼他们为“老板”。刘镇华时期是这样，李品仙时期依然这样。

刘镇华的班底有两多：前清有功名的多，当过北洋政府时的国会议员多。根据我的记忆，这一班人马是：省府秘书长胡石青（国会议员，未就职）；王印川（清举人，国会议员）；省府秘书主任万自逸（清进士）；第一科长郭光麟（清秀才，国会议员）；第二科长郭海峰（清秀才，国会议员）；民政厅厅长马凌甫（清附生）；秘书主任南岳峻（清举人）；秘书刘尊輿（省议会议员）。其中马凌甫和王印川是刘镇华的两个主要助手。

一个官僚和学者混合型的人物——马凌甫

马凌甫是陕西郃阳人，原名马步云，和刘镇华的关系最深最久。辛亥革命时，他曾代表陕西参加十七省代表会议（在南京举行），组织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选举孙中山为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刘镇华任陕西省长和督军时，他先后担任过陕西省议会议长和陕西教育厅长。从此就和刘镇华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刘镇华只任军职时，他曾以总参议的名义，代表刘镇华在北京和太原与张学良、阎锡山等，进行联络周旋达数年之久。30年代任安徽省民政厅长并代理省主席。40年代做刘镇华的弟弟刘茂恩的助手，任河南省政府的秘书长，直至刘氏兄弟逃往台湾为止。

马凌甫虽然从政多年，但一直不脱书生本色，且不忘研究学术。他在日本留学时，就翻译过日本梅津美次郎所著的《国民经济学原论》。译笔流畅，风行多年。返国后，又曾译过日本关一所著的《工业政策》，二书都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

马凌甫于1924年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时，曾邀请北京许多名流学者到西安暑期讲习班讲学（鲁迅先生也是被邀请者之一），传播新文化，批判旧文化，使西安的新文化运动十分活跃，旧势力受到打击。马凌甫在民政厅长任内，虽然工作繁忙，但仍然购买了《图书集成》和《四部丛刊》等大部头丛书，不时浏览翻阅。他不好酒食征逐，也没有声色犬马之好。他虽然在刘镇华兄弟手下做官几十年，但大多出于被动，他也有不少上层的关系，可他并不奔走钻营。他性情温和，对僚属从无疾言厉色，也不玩弄什么权术。30多年的中上级的官僚生活，又养成他与一般学人不同的习惯。

在安徽的时候，他不到50岁，高大的身材，双目炯炯有神，又不苟言笑，本来就有点奇特，偏在省府的厅长和委员包括刘镇华在内，只有他和一个省府委员范滋泽留着胡须。范因颊毛太盛，本有范胡子之称，原无足怪，而他却留着短短的胡须，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据说清朝人，只要做了官，无论多么年轻，都要留胡须，这是一种官体，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

其地位之尊。北洋政府时的许多文武官吏也是留胡须的。马凌甫的留须大概是他旧的官气的遗留吧。

马凌甫在代理省主席的一年多时间中，经常到各处讲话。每次讲话都由我随行记录，整理发表。以后并印成《马凌甫讲演录》一集、续集，分发省内各机关和专、县、区各级行政机关。他每出行，必令我随行。如果是在城内或近郊，除卫兵之外，就我一个随往；如果是远行，除我之外，他往往在民政厅中再约一个秘书同往。其中和他同行较多的，是陕西人刘尊舆和另一个姓王的。有一次到太湖、宿松等县视察水灾，同行的还有民政厅的主任秘书南岳峻。他们和马凌甫不仅是同乡，而且都是很好的朋友，刘尊舆还可以说是他的亲信。路途无事，当然无所不谈。有时他们也谈陕西的旧事，但总的来说，谈琐事轶闻较多，谈政治很少。当时鄂豫皖边区是红军的根据地，刘镇华又兼任“豫鄂皖边区剿共总司令”，专事反共，但马的私下谈话中从没有谈到“剿共”之事，即使在他的各种讲演中，也很少谈到剿共的问题。

这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也不难理解。刘镇华的班底大都是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并且多半在北洋政府时代做过官吏。他们从开始求知识那天起，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做官”，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并不是因为那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有官瘾，而是因为各种社会事业极不发达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就只有做官和教书。

辛亥革命以后，以宋教仁为首的一些国民党人所追求的政党政治并未实现，所以一般官吏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信仰。国民党当政时期，象马凌甫这样的政务官员，虽然也需要国民党的党籍，但因当时国民党内部汪、蒋、胡三派鼎立，刘镇华等都不属于上述三派的任何一派，所以他们就和新政学系的杨永泰等靠拢，以求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的人都知道：无论旧政学

系或新政学系，都是一批官僚和政客的集合。他们不吸收青年，也不吸收下级官吏，他们的成员都是中层以上的官吏、政客和军人。他们不提出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政纲，只是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以求保官和升官而已。

所以当时他们虽然执行的是反共的政策，他们原本的思想也是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但他们确实和CC分子及军统不一样。CC分子和军统组合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反共，而马凌甫他们的注意点却是如何选择良吏，兴利除弊，希望比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文明状况略好一些。

就马凌甫和我的两次谈话，可以说明他的思想。大概是1934年的春天吧，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全国推行合作事业。安徽的桐城地区是合作事业重要试点之一。开幕典礼那天，马凌甫应邀前去讲话，我随行。在我们正要动身的时候，安徽省党部调查室的（即中统）负责人魏寿永来谈调查室经费之事。他敷衍魏几句之后，我们就上路了。我们坐的是小轿车，路上大概要几小时，闲谈中，我就以魏的事为话题。

我说：“听人说，魏寿永原来是共产党员，可是现在专门干反共的工作了”。他说：“真的么？那就太不应该了！”接着他就说：“我不赞成政党之间以兵戎相见。用特务的手段捕杀共产党人的办法，也应该考虑。”接着他就沉默下来，不再说话。大概因为自己是国民党的现任官吏，而且又是蒋介石亲自主持的豫鄂皖三省的“剿共”区域之内的省级负责人，说这话有些不妥吧。

他一向说话谨慎，又和我的地位悬殊，年龄相差二十几岁。我料到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会再谈下去的，所以我就转了一个话题，我说：“代主席（当时都以此称他），听说辛亥革命时你参加了各省代表会议，参加了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

织法，又参加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你们必然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和治国方针有些想法，你能给我讲讲么？使我也可以得到一些教益。”他笑了一笑说：“这倒可以谈谈。”他说：“我在年轻时，并不喜欢参与政治活动。在日本留学时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不是学法律，就是学军事。我在日本学的是经济，力量也用在翻译著作方面，其目的在于返国之后，效力国家，振兴中华。辛亥武昌起义，我们从东京返国。各省纷纷独立，便先后在武汉、上海举行各省代表会议，筹备建立政府。因当时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军队还控制着长江以北各省，陕西虽然宣布独立，但还无法派代表南下。当时我正在上海，所以就便当了陕西省的代表。这件事就是这样。对于政治理想和政府的形式，当时共同的主张就是民主政治，也就是政党政治。仿照西方和日本的模式，成立政党，进行竞选，胜者当政。当时除了满人的‘宗社党’以外，甚至以保皇党著称的梁启超，也主张政党政治。”

我说：“我从中学读书起，就不断参加政治活动，徘徊于各种政治主张之间，碰过钉子，走过弯路，现在迫于生计，在代主席领导下工作。但是政治的变化大，风险大。所以我现在业余想专攻一点专门知识，将来改换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不知代主席认为我这想法对不对？”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大的政治家，应该有政治主张；一个大学者，应该有学术主张。一般的人，应该是个实际主义者，就自己现有的职务，踏踏实实做好它。只问耕耘，不计收获。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见异思迁。我一生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次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谈话。

1946年2月，河南省政府改组。刘镇华的五弟刘茂恩仍任省政府主席（1944年7月即任主席），其时新任省府秘书长马凌甫，民政厅长张辛南以及省府秘书处和民政厅的科长秘书等

几乎全是过去在安徽时的熟人。我自1928年离开开封以后，距此时已有18年之久，很想回去看看。

那时我正在宿县担任县长。日本投降之后，我本想在和平的环境中做些建设工作。可是到1946年初，已经看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经不可更改，内战的准备十分积极。国民党的“剿共”军事机构所谓绥靖公署已在蚌埠成立，宿县地处军事要冲，构筑工事，征粮派伕，均是地方政府之事。我不想参加反共产党的工作，就一再坚决请辞，被安徽省政府批准之后，我就乘便请假返回开封，时间大约在1946年的五六月间。在开封，我特意的拜访了马凌甫和张辛南，而这也是我回开封的主要目的。我和马的见面是在一个晚上。

我和他阔别已经10年了。他详细地询问了我和他们离别以后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并告诉他：我刚刚辞去了宿县县长来的。安徽的情形他是很熟悉的。他就问：“宿县是安徽的最大县，又处在交通要道，为什么要辞呢？”我把我辞职的想法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他又问：“你此后准备做什么？”我说：“安徽省政府已经把我调任为民政厅的主任秘书了。不过我不准备到职。我的经验，还是县长能够做点实际工作。因此，我想到皖南去做县长，那样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与国家有益的工作，总比当秘书舞文弄墨强一些。”他点点头，停了一会说：“要能做到，这个想法还不错。长期抗战之后，希望注意到‘与民休息’。”我问他：“现在河南省的施政方针是什么？”他说：“我到职才不过两个多月，身份又是一个幕僚长，谈不上什么自己的主张。现在抗战结束还不到一年，国共之间，还在和谈，我也只是希望有一个和平环境做点事罢了。至于将来的计划，还没有考虑。”这一次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以后我们也没有联系。解放以后，他家住南京，听说还受到适当的照顾。这可能和他的温和淡泊

的性格、实际主义追求有关吧。

投袁起家，助刘肇蒋的政客——王印川

王印川是河南修武人，光绪末年中举后，被河南省官费送往日本留学，学习政治。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因陕豫两省接壤，又和于右任结为友好，共同参加排满活动。1909年起，先后参加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报的工作。三报都激烈攻击清朝廷，批判专制制度，倡导各地民主运动，深受读者欢迎。《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后，又转而揭露袁世凯的各种阴谋，为袁世凯查封。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坚决主张建都南京。在以后他让位于袁世凯时，仍然把建都南京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袁世凯自知他的势力都在北方，南方全是国民党的势力。如若迁都南京，他一定要受制于南方的势力，所以他不但肯南下就职，而且不惜制造兵变为他拒不南下的借口。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的唯一理由是：北京为元、明、清各代的京师，封建专制的习惯势力太大。为防止这种势力的侵袭，就一定要离开北京，建都南京。当时，反专制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袁世凯很难拿出理由来反对迁都。正在这时，王印川却在国民党所办的《民立报》上发表了仿左思所著《三都赋》的文章，以论证西安、南京、北京三地历代建都的得失。他说秦汉建都陕西，虽也盛极一时，但秦朝很快灭亡。唐的版图也没有超出中国本土之外。建都南京的吴、东晋、宋、齐、梁、陈，无论时间长短，都始终是僻处一隅的偏安之局。只有建都于北京的元、明、清三朝，其威力之盛和版图之广，才是跨越百代无与伦比的。这种论证，对袁世凯的不想迁都南京，真是一副救命良药。而这篇文章载之于国民党的报纸，出自于同盟会员之手，就更使袁世凯喜出望外。袁世凯的党羽遂纷纷借此理由，反对